

# 論三國故事對街亭之戰情節之改編及馬謖人物 形象轉變之意義

謝予騰\*

## 摘 要

街亭之戰，是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敗的關鍵戰役，而其中的重要人物，便是領兵鎮守於街亭的參軍馬謖；雖然此段情節於後世的三國故事中多有改編，人物形象亦有不同的塑造，但已經讓馬謖的人物形象，幾乎只剩下了「失街亭」。

在《三國志》的記錄中，馬謖確實在戰爭當下，有違反諸葛亮命令的情況，進而導致蜀軍的敗戰；然而，回到歷史中，對馬謖進行仔細的探討，不難發現在後世改編故事中，戰敗的因素與情節，無論是否依循著歷史脈絡發展，在許多的細節上，都將過錯怪罪於馬謖，而幾乎未曾深刻地檢討過諸葛亮的用人決斷與其背後動機。

此類有差異的細節，若拿來與史料比對，可以發現創作者不是只順著三國史料記載來發展情節，更是有意識地淡化了諸葛亮於街亭之戰裡，任用馬謖為主將的客觀因素——這也可看出，後世對馬謖人物形象不斷轉變的原因。

本文將透過對比歷史和街亭之戰的故事情節改編，來探討馬謖人物形象的轉變以及其背後的意義。

**關鍵字：**街亭、馬謖、諸葛亮、《三國志》、《三國演義》

---

\*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至今，學界對馬謖（190-228）<sup>1</sup>的關注與研究，主要分成歷史情節和三國故事兩部分，在歷史情節方面大抵圍繞於諸葛亮與劉備等人的識人問題，又或關於馬謖究竟是病死獄中又或被諸葛亮（181-234）處斬等，這部分包括尚志邁的〈馬謖之死考辨〉<sup>2</sup>、張寅瀟的〈從蜀漢派系鬥爭看馬謖之死〉<sup>3</sup>、鄭伯彰的〈馬謖敗於街亭試論——詮構諸葛亮從「違眾拔謖」到「揮淚斬謖」之本末源流〉等文都是可觀之作，其中，鄭伯彰針對了馬謖在諸葛亮為何用馬謖守街亭的問題上提出以下看法：

綜而論之，諸葛亮的「違眾拔謖」，雖導源於和馬家有深交，但主要還是因馬謖本身並非庸才，就他「好論軍計」的特質而言，他是有遠謀的，適逢蜀國當時正乏深謀遠慮的將才，諸葛亮為了培植接班人，以讓新舊人才得以交接，馬謖是必須接受考驗的……假使筆者文中所論「馬謖的守街亭是諸葛亮儲備人才之部署」這一論點得以成立的話，那麼街亭的失守……對蜀國的長遠發展來說，未必是一件絕對的壞事。<sup>4</sup>

鄭氏之文點出馬謖的諸葛亮的關係雖影響了派守街亭人選的問題，但也同時指出：「吾人在審論『諸葛亮擢用馬謖』一事時，實不當僅將焦點置於『馬謖失守街亭』的單一事件上，更應該當諸葛亮『擢用馬謖』的原委作一深究。」<sup>5</sup>此觀點與本文探討的出發點有相近之處。

<sup>1</sup> 馬謖為馬良族弟，〔西晉〕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2011）記載：「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良弟謖，字幼常……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蜀書九，頁四上-五下。）諸葛亮第一次伐魏是蜀漢建興6年（西元228年），時馬謖39歲；而馬良隨劉備征東吳戰死是蜀漢章武2年的夏天，也就是西元222年，當時36歲。推算回去，馬良生於東漢中平4年（西元187年），馬謖則是東漢初平元年（西元190年），兄弟相差3歲。本文所引之《三國志》皆據此本，後續引文僅標註篇名與頁碼，不另加註。

<sup>2</sup> 尚志邁：〈馬謖之死考辨〉，《張家口師專學報》第16卷第3期（2000），頁1-4。

<sup>3</sup> 張寅瀟：〈從蜀漢派系鬥爭看馬謖之死〉，《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19），頁27-33+76。

<sup>4</sup> 鄭伯彰：〈馬謖敗於街亭試論——詮構諸葛亮從「違眾拔謖」到「揮淚斬謖」之本末源流〉，《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1期（2004），頁211。鄭氏之文主論點為，馬謖非庸才，諸葛亮用之守街亭除了有私交外，亦為培養接班人而為之；然而，就建興六年的情況而言，諸葛亮確實有意為蜀國多培養人才，收姜維便是重要的指標之一，但是否將馬謖視為接班人來培養，實則難以得知。

<sup>5</sup> 同前註，頁210-211。

從三國故事方面切入的文章，有王月華與張祝平所著〈戲曲《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情節分析〉一文，亦有以兵法觀點帶入小說情節的作品，如潘志忠所著〈由《孫子》析論馬謖失守街亭——以《三國演義》為例〉<sup>6</sup>便是，此類文章大多著重於三國故事情節或相關創作本身，以上引用的材料，對馬謖的討論大多不深刻。

當今談及馬謖，已有許多文章對其才能與評論有所反思，但仍鮮少論及後世故事情節中對於馬謖人物形象的改編與塑造，包括對於身世的設定的省略與修改、參與戰役的環境、條件的改變，以及馬謖面對死亡時的態度等等問題；與本文概念較為接近的，只有劉硯秋的〈馬謖缺失於「南征戲」的主要原因略論〉，其中寫到：

馬謖在治理南中時有較好的成績，針對武侯南征也提出了很關鍵的策略。而戲曲沒有像小說一樣加以鋪演，一是由於馬謖的故事在發展中形成了以「失街亭」故事為主的情況；二是由於戲曲本身的特性即是人物形象的統一和頭緒的精簡；三是由於諸葛亮的形象越發高大，便在文學作品中或多或少地被附會以別的人物的故事，最終馬謖不見於表現武侯南征的戲曲作品之中。<sup>7</sup>

此論點與本文的概念頗有相似之處，但劉氏於文章中並未對歷史與小說進行大篇幅細緻的比較，論述方面也著重於戲曲，為與本文不同之處。

回顧三國時代的街亭之戰，無論在正史或諸多後世三國故事中，都被認為是直接導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敗的關鍵原因，這也使得馬謖的人物形象，已經和「失街亭」深刻地結合在一起，連帶著馬謖之死與諸葛亮的敗戰處理，都成為了文學、戲劇等作品和學術研究經常運用、討論的題材——然而，在三國故事的演變過程中，「街亭之戰」的樣貌，在不同時代的故事，除了和史料有不同之外，情節上實則有著明顯的差異，包括魏、蜀兩方出現的人物也都有所不同。

這樣的情況，除了呈現出了不同時代創作者的觀點外，也顯示了不同時代對於三國時代的想像，雖然今日包括《三分事畧》、《三國志平話》、《三國志傳》等作品之作者不明之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是否為羅貫中（?-?），學界也有著許多不同的見解，<sup>8</sup>但

<sup>6</sup> 潘志忠：〈由《孫子》析論馬謖失守街亭——以《三國演義》為例〉，《正修通識學報》第16期（2019），頁81-98。

<sup>7</sup> 劉硯秋：〈馬謖缺失於「南征戲」的主要原因略論〉，《湖北文理學院學報》第42卷第6期（2021），頁16。

<sup>8</sup> 關於羅貫中之生平，現今資料仍少學界仍有爭論，但大抵可知羅貫中約為元末明初之人；依此假說，嘉靖壬午年（1522年）明初也已上百年之久，就算《三國志通俗演義》實為羅貫中所著，亦難保今見之版本於期間已經他人修改或偽託，故而在出現更多證據之前，羅貫中之為《三國》作者一說，仍是還是存在著爭議的說法。

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創作者必然受到身處時代的影響，帶著不同的角度來書寫、改編正史中的「街亭之戰」。<sup>9</sup>

而情節的改變，也同時牽動了其中人物的表現與形象，在史料中領兵鎮守街亭的馬謖，其行為確為該次蜀軍北伐落敗的重要因素，但就不同時代的情節所呈現的內容，馬謖的重要性無論被抬高，又或被貶抑，都與本來就已經有爭議的史料有所差異，而這些差異背後所顯示出，創作者對於馬謖乃至於諸葛亮的詮釋與想像，也是本文將探討的重點之一。

必須強調的是，街亭之戰的故事情節差異，到了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以下稱「嘉靖本」）往後，包括清初毛宗崗父子評點的《三國志演義》在內，情節與出場人物基本已定型，未再出現如過往巨大的變化，故本文的討論將集中於自正史《三國志》開始，<sup>10</sup>經《三分事畧》、《三國志平話》，終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sup>11</sup>

## 二、史料記載與後世改編

關於「街亭之戰」的樣貌，<sup>12</sup>可以分為戰爭歷史和後世改編之故事情節，兩個部分來討論。

<sup>9</sup> 三國故事的演變，到唐代雖已有部分痕跡，但目前可見之最早話本，乃元代之《三分事畧》和《三國志平話》，兩者雖有許多相同之處，然於斬馬謖一段卻正好有差異，故而本文兩部作品都將討論；至於雜戲中的三國故事，雖現今包括《全元曲》和《孤本元明雜劇》中有共二十一種作品，但其中並未有街亭之戰相關的故事，故而未用之。

<sup>10</sup> 街亭之戰發生時代為三國時期，故史料上以《三國志》為主，然除了部分人物事蹟如司馬懿家族需參閱《晉書》之外，《資治通鑑》亦被為影響《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重要著作，雖時代上有距離，但仍有參考價值，本文也會一併於正史部分討論。

<sup>11</sup> 關於《三國志傳》與《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先後問題，目前學界有不同看法，其中關於爭議較明顯的「黃正甫本」的時代判定，日本學者中川諭認為：「黃正甫本比嘉靖本、葉逢春本等繁本系統的版本文章很簡略，插入了關索故事和周靜軒詩，完全符合簡本系統的條件，確實是屬於簡本系統的一本版本。但是一方面，它的文章與其他的簡本諸本差別比較大。而且那些差別，有些地方接近於二十卷繁本系統的文章，有些地方與所有《三國演義》諸版本不同，就是黃正甫本獨自的文章。前者保留著簡本系統比較古老的樣子，而暗示從繁本到簡本的分化過程。後者顯示簡本系統諸本的文章改變過程的一側面。那麼可以說，黃正甫本雖然是明代天啟年間出版的一本版本，但是也是顯示《三國演義》版本變遷過程的一個很重要的資料。」（節錄自〈黃正甫刊《三國志傳》三考〉，《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10年第7期，頁15）但無論版本之先後，《三國志傳》的年代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相去不遠，其中的街亭之戰情節和馬謖的形象，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差異相對於《三分事畧》、《三國志平話》而言亦較為有限，故本文並未將《三國志傳》列入討論之中，此情節可見《三國志傳》（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本），卷16，頁20-26。

<sup>12</sup> 關於「街亭之戰」發生的確切地點，當今學界仍有許多不同意見和討論，但大抵可以確定於今中國甘肅省天水市周邊地區；然此討論與本文關連性不強，故於此提出，懸而不論。

## (一) 史料記載

關於街亭之戰的始末，按〈諸葛亮傳〉所載如下：

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頁十下-十一上。）

這一段文字大致性地勾勒出了當時的情況，也就是在諸葛亮建安六年的北伐，以馬謖在街亭前線違背了諸葛亮的節度，敗給了張郃（?-231）作收，諸葛亮除了在西縣帶回了千餘戶的人口之外，回到漢中之後將馬謖下獄、定罪並處死以向眾人謝罪與交代。

關於街亭之戰，〈明帝紀〉、〈曹真傳〉、〈馬良傳〉等傳記篇章中，也有簡短的記述，但對於戰事經過並未細說，而在這方面著墨較多者，為〈張郃傳〉與〈王平傳〉，各別記載如下：

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三國志·魏書十七·張郃傳》，頁十二上-十二下。）

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三國志·蜀書十三·王平傳》，頁八上-八下。）

根據以上三段的敘述，大底可以推論街亭之戰的情況，應是諸葛亮派遣馬謖、王平（?-248）等人領軍守街亭，與張郃率領的魏軍發生交戰，〈諸葛亮傳〉中所載「謖違亮節度」，應是〈王平傳〉中指馬謖「舍水上山」一段，也呼應了〈張郃傳〉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的記載，於是馬謖所統之蜀軍取水的道路就遭到張郃切斷，導致被魏軍擊潰，進一步造成諸葛亮的北伐失敗。

然而，在《三國志》中有兩個戰場外較細節的文字記載，也值得被關注，其一是前文提及的〈馬良傳〉，其中記載了諸葛亮當初起用馬謖的片段：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三國志·蜀書九·馬良傳》，頁五上。）

這一段文字，說明了當時蜀軍不以其他在場將領帶兵，而是由馬謖領軍守街亭的決定，是由諸葛亮個人意志，獨排眾議的結果——起碼在當場是未見因為將領不足或有其他受迫性的因素，來造成諸葛亮只得起用馬謖的情況。

其二，除〈馬良傳〉外，裴松之在〈諸葛亮傳〉後的注解中寫到的一段文字，也頗值得注意：「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頁廿二上。）

就此二點看來，第一點或許可能，而第二點在邏輯上相對難以接受，否則諸葛亮何不親守街亭？但此二點之差異，可說明即便在年代相對靠近的史料記載中，對此戰爭的情況，都存在著歧異的觀點。

繼《三國志》後的歷史性記錄中，《資治通鑑》也對街亭之戰有相關記載：

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sup>13</sup>

這一段記載，基本上即為前述《三國志》各人物傳記的統整，相對完整地將街亭之戰的歷史輪廓進行了整理，也大抵奠定了部分後世三國故事中的情節。

<sup>13</sup> [宋]司馬光著，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臺北：文光，1972），頁2241-2242。

## (二) 後世改編

雖說《資治通鑑》已將街亭之戰的歷史有了較為完整的交代，但不同時期三國故事的情節發展，卻不全然按照此路線進行。

三國故事到了唐代，便極可能已出現於說話藝術中，這點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李商隱的〈驕兒詩〉即為一例，<sup>14</sup>不過整體而言目前可見的三國故事而言，寫及街亭之戰，當以《三分事畧》和《三國志平話》最早，而其中所寫之街亭之戰<sup>15</sup>不只故事情節、時間背景不同，連其中的人物也和史料有明顯差別。

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三分事畧》中，街亭之戰發生的時間，從第一次北伐變成了第二次，魏軍與蜀軍的攻守立場也完全轉換了過來，情節更改編為姜維（202-264）與魏延（？-234）攻打、戰勝了駐軍於街亭，按史料當時已經離世的夏侯惇（？-220）——而整個過程中完全沒有提到馬謖；<sup>16</sup>到了至治年間（1321-1323）刊刻的《三國志平話》，在《三分事畧》的基礎上，將第三、第四次的北伐戰場都聚焦在街亭，而到了第四次北伐，才將街亭丟失給了魏國，原文如下：

軍師再出祁山第四。前到隔茅關，又名皆庭，離關五十里，眾官接著，又行四十里下寨。諸葛問：「皆庭怎生？」有佐貳官楊儀、姜維言曰：「馬謖失了皆庭。」諸葛大驚：「此乃拒險之地，如何失了？」姜維言馬謖帶酒，司馬懿搦戰，馬謖出戰，魏延勸，連罵數句，眾官勸不住，馬謖又罵太守，言：「軍師者吾乃鄉人也，吾失了城不碍。」魏軍先困了馬謖，眾官去殺，後失了皆庭。軍師令人喚到當面問，馬謖無言支對，推出交斬。眾官告不得，斬了馬謖。<sup>17</sup>

相較《三分事畧》，《三國志平話》將馬謖帶回到了街亭之戰的故事中，並且也循歷史的說法，將大部分如不肯據城而守的責任歸到馬謖的身上，並在最後殺之謝罪；然而，馬謖的對手，卻由張郃變成了司馬懿，且整體情節亦與《三國志》等正史有著極大的出入。

相對起內容上較為簡化的《三分事畧》和《三國志平話》，嘉靖本街亭之戰的篇幅，接續第十九卷的〈司馬懿智擒孟達〉後，擴寫為〈司馬懿智取街亭〉、〈孔明智退司馬懿〉

<sup>14</sup> 原文：「李商隱〈驕兒詩〉（集一）亦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喫。』似當時已有說三國故事者，然未詳。」，節錄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2009），頁181。

<sup>15</sup> 《三分事畧》、《三國志平話》中，「街亭」寫為「皆庭」。

<sup>16</sup> [元]佚名：《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畧·下》（上海：上海古籍，1994），頁十八上-十八下。

<sup>17</sup> [元]佚名：《新全相三國志平話·下》（上海：上海古籍，1994），頁十八下-十九上。

和第二十卷的〈孔明揮淚斬馬謖〉這三段故事，史料的運用與改編上也更為豐富與靈活，例如司馬懿（179-251）、司馬昭（211-265）父子的登場，諸葛亮的空城記，和最後斬殺馬謖的橋段，都是基於部分史料再加以改編而產生的情節。

其中，與戰場有關而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三點，其一是在派遣馬謖鎮守街亭的決定上，嘉靖本去掉了《三分事畧》和《三國志平話》對姜維等人的描述，讓較近於史料的馬謖領兵，但與史料不同的部分，是馬謖乃「自請領兵」，除了決策過程中沒有受到蜀軍將領們的反對外，諸葛亮在對話中，也顯得對這個決定並不完全放心；其二是就出兵前諸葛亮和馬謖的對話，以及到了街亭現場後馬謖和王平的對話，可見情節中的街亭應是無城可據之地，此二段原文分別如下：

孔明從之。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即喚王平，吩咐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托汝去。汝可小心謹守此地。下寨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且不能偷過也。如安了營寨，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圖本將來。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之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辭，引兵而去。<sup>18</sup>

卻說馬謖、王平兵至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卻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也？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此山上屯軍。」<sup>19</sup>

這點和〈張郃傳〉所載明顯不符，和《三國志平話》中的情節亦不相同；第三部分是馬謖逃回到漢中後，是當下就被問罪，然後就直接斬於轅門之外，這和前段引《資治通鑑》中，馬謖的下獄的部分不符外，也和《三國志》中馬謖的記載有所出入。<sup>20</sup>

### 三、馬謖的形象轉變

<sup>18</sup>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1994），卷19，頁七十上-七十下。

<sup>19</sup> 同前註，頁七十一下-七十二上。

<sup>20</sup> 「空城記」就這段小說情節中，確實是重大的改編，對後世影響亦大，但該情節實與馬謖人物沒有直接關係，主要是將情節的重心放在諸葛亮和司馬懿父子的鬥智與心理戰上，故而未於此列為本文之討論重點；此外，朱熹《資治通鑑綱目》中，對街亭之戰的說法，基本截錄自《三國志》之不同篇章，但其以蜀漢為正統之史觀特殊，故於此提出，不再申論。



上述情節的改編，都個別地影響了後世三國故事、小說讀者甚至研究者們，對於包括諸葛亮、馬謖等人物形象的理解；而馬謖的人物形象究竟被形塑得如何，必須再回到史料中爬梳，並對比改編作品後，才能夠看得較為清楚。

## （一）史料中的馬謖

關於馬謖的史料記載並不多，主要可見於《三國志》、《華陽國志》<sup>21</sup>和《襄陽耆舊記》<sup>22</sup>等，但大抵不出《三國志》的內容；而在這些記載中，馬謖的職位與其性格分析，是較有助於瞭解後世對該人物形象改變的兩個重點。

### 1、職務

《三國志》記載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可見他一直對軍事、戰爭方面頗有興趣，雖然被劉備（161-223）評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但馬謖仍頗得諸葛亮賞識，除了陳壽記載「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之外，裴松之也記到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馬謖「送之數十里」，並以「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為諫，這也使諸葛亮得以平服孟獲（?-?），由此可見諸葛亮與馬謖兩人間的關係。

然而，在跟隨諸葛亮北伐之前，儘管馬謖曾擔任過「縣竹成都令、越巂太守」等，這些與地方上的治安、軍事有一定程度關係的職務，但終究不過地方官性質，和真正在戰場上帶兵打仗的武將、將軍有別——<sup>23</sup>也就是說，雖然馬謖在軍事方面看似頗有熱情，但是在這些職務期間，並沒有任何馬謖真正帶兵上陣過的記錄，同時能合理推論，馬謖應未參與過真正的大戰。

而當諸葛亮於街亭一役，獨排眾議「使馬謖統大眾在前，與郃戰于街亭」，也就是《三國志》中馬謖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真正帶兵上戰場；不過於此，只看見孔明讓馬謖「督諸軍」，但並沒有明寫授予任何正式的軍事、武將職務，而王平的傳中則提到王平「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也就是說，馬謖應該是以參軍的身份出戰，而終其一生，始終

<sup>21</sup>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2007）。

<sup>22</sup> [晉]習鑿齒著，黃惠賢校補：《校補襄陽耆舊記》（北京，中華，2018）。

<sup>23</sup> 孔令紀等人主編的《中國歷代官制》（山東，齊魯書社，2010年1月），於頁111~112中寫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地方政府機構基本上是州、郡、縣三級制度，州設刺史，郡設太守，縣設令長。」；又在頁114中寫到「各郡置太守。太守領兵的，加將軍名號。」由此看來，馬謖在越巂太守職間並未記載被加與將軍名號，理論上應未獲兵權。

沒有得到一個正式武將、將軍的職位。<sup>24</sup>

## 2、性格

馬謖的性格，則可以從他在戰場上的態度，和面對下獄、處死前的記載來分析。在《襄陽耆舊記》中為「長八尺，才器過人，善與人交，好論軍計」<sup>25</sup>，這段可見平時的馬謖，在社交關係上應相對活躍；然而，若以〈王平傳〉所載來看，馬謖臨陣，除了不遵諸葛亮調度之外，對於王平由下而上的規諫也無法接受，這裡可見馬謖應有一定程度的自負，自我主見甚強。

而在街亭大敗之後，馬謖逃回到漢中到處死之前，有一段時間是被關進牢房裡的，這點除馬謖的傳記中寫到「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之外，在〈向朗傳〉中還記載了馬謖有逃亡的企圖：「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三國志·蜀書十一·向朗傳》，頁四上。）

此處所言「逃亡」，有三個可能性，其一是在街亭戰敗之後，從軍隊裡逃亡出來，沒有與部隊共生死；其二是戰敗後逃出部隊，但害怕回到漢中後會被降罪，因而企圖逃亡至它處或其它勢力；其三是被關進牢獄後，馬謖有逃獄的準備。

這三個可能性裡，第二和第三是較符合邏輯、可能性較高的，因為馬謖在街亭戰敗並脫離戰場一事，理論上除了和向朗無關之外，諸葛亮在前線亦理應掌握了一定的情報，不需要由留在漢中的向朗來通報，<sup>26</sup>同時《華陽國志》中亦載：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休)沐、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為郃所破。平獨斂眾為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沐、盛以謝眾，奪襲兵，貶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臧否，免罷。<sup>27</sup>

可見向朗知道馬謖要逃亡卻沒有向上呈報，被諸葛亮視為極不妥當的行為，甚至到了「恨」的程度——由此推論，馬謖的「逃亡」，比較可能是三個可能性中的後兩者，其事態方會嚴

<sup>24</sup> 〈郭淮傳〉中寫到：「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看似馬謖被賜予將軍，但實際上在蜀書中馬謖只見「參軍」而不見將軍號。見《三國志·魏書二十六·郭淮傳》頁十六下；又據《華陽國志》亦載：「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休)沐、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為郃所破。」（頁 392-393），也說明在蜀國方面，應未授予馬謖正式將軍職位。

<sup>25</sup> [晉] 習鑿齒著，黃惠賢校補：《校補襄陽耆舊記》，同註 22，頁 35。

<sup>26</sup> 〈向朗傳〉中載：「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其中未有向朗隨軍北伐之記載。

<sup>27</sup> [晉] 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同註 21，頁 392-393。

重如此。<sup>28</sup>

而無論是第二或第三個可能性，都是馬謖企圖以逃亡的方式來躲避自己的罪行，於此看來，馬謖並不能算是一個勇於認錯或性格剛強之人，甚至可以說有一點懦弱的成份，尤其是在注解中裴松之引《襄陽記》的段落，寫到他臨終前交給諸葛亮書信的內容，更可以用乞求來形容：

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原深推殛絲於羽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頁五下。）

由此可推論，歷史中的馬謖，在蜀國內部確有一定的聲望與良好形象，在其「軍計」的能力上，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故雖然先主劉備對之有所批評，但仍受到諸葛亮與部分人士高度推崇；<sup>29</sup>然而若就行為來論其性格，則馬謖確實有其過度自負與懦弱的一面，絕非完美無缺之人。

## （二）後世的解讀、淡化與改編

關於馬謖的人物形象的解讀，在元代的三國故事之前，從唐宋文人的詩文中便能略見一二，如李商隱的詩作〈隨軍東〉中便寫到：「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鬥心。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sup>30</sup>，柳宗元的〈書明謗責躬〉中也寫到：「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也。」<sup>31</sup>蘇軾則在〈擬進士對御試策（並引狀問）〉中寫到：「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sup>32</sup>蘇轍亦於〈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一文中寫到：「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sup>33</sup>

<sup>28</sup> 關於馬謖之死，尚志邁認為，馬謖其實是下獄而死，非為諸葛亮所殺，而是自然死於獄中；然《三國志》中，〈諸葛亮傳〉以「戮」、〈王平傳〉以「誅」、《華陽國志》以「戮」，來記諸葛亮對馬謖之處份，單以〈馬良傳〉中「物故」之說法意圖翻案，難以令人信服，故本文立場仍是認為，諸葛亮最後是殺了馬謖，而不是讓馬謖死在獄中。

<sup>29</sup> 《三國志·蜀書十·廖立傳》：「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頁八上）可見馬謖當時的形象在部分人士的概念中應甚良好。

<sup>30</sup> 〔唐〕李商隱：《李義山詩集》（上海：掃葉山房，1920），卷3，頁二十二下-二十三上。

<sup>31</sup>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臺北：河洛，1974），頁485。

<sup>32</sup>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1975），頁579。

<sup>33</sup> 〔宋〕蘇轍：《蘇轍集》（臺北：河洛，1975），頁362。

由以上文獻看來，馬謖的人物形象是相對負面的，被當成是諸葛亮識人和決策上一個代表性的錯誤，並且這一觀點，與「帝蜀寇魏」、「尊劉抑曹」的風氣不完全契合，<sup>34</sup>也就是說無論士人看法與民間故事對蜀漢政權是否同情，馬謖的負面形象都沒有明顯轉變。

而到了元代的三國故事中，《三分事畧》和《三國志平話》都明顯在情節裡，將馬謖的重要性給淡化了——這些三國故事，無論創作者加入了多少不同的元素、改編多了少與史實不同的情節，本於《三國志》而來的原型是確定的，也就是說這些創作者要完全不知道《三國志》的內容為何的機率並不高，同時整個三國歷史中唯一在街亭發生重要戰役的，也只有馬謖的這一段。

故而，當《三分事畧》對馬謖完全略而不談，《三國志平話》則是以相對於姜維、魏延等主要人物，將馬謖出場的情節大幅縮短，並塑造成了一個喝了酒而丟了街亭的扁平人物，再加上兩本作品的內容中，在諸葛亮北伐的情節裡，都大量地以街亭為背景來進行創作之時，便可以合理推論，對馬謖的忽略與淡化和形象的改造，都是刻意為之的結果。

到了嘉靖本中，馬謖的出場，則是在第十一卷〈諸葛亮傍略四郡〉中，由伊籍將兩人介紹給劉備：

籍曰：「要知荊州久安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願公一言，以薦賢者。」籍曰：「荊、襄世家，兄弟五人，惟一人大賢者，眉間有白毛，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良，字季常。其四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其弟馬謖，字幼常。亦異人也。」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入見玄德，禮畢高坐。<sup>35</sup>

在這段中，雖透過伊籍的口中，說出了馬謖與馬良兄弟二人，但情節中當時真正被劉備請來的，只有馬良一人，而不見馬謖，一直到第十八卷〈諸葛亮一擒孟獲〉，才看到馬謖於情節中出現：

<sup>34</sup> 關四平認為：「適應時代社會心理的趨向，帝蜀寇魏應時而生，以東晉史學家習鑿齒為代表。他提倡帝漢（蜀）寇魏說，主張以蜀漢為正統……習鑿齒的帝蜀寇魏說非個人的忽發奇想，標新立異，而是反映了當時民族的願望與要求。在士人層面，晉人傅玄、李興、張輔等士子對蜀漢英傑的推崇，反映了當代士人與習鑿齒的共同心聲。」（節錄自《三國演義源流研究》（上編：成書研究）（臺北：龍視界，2014，頁137-138）晉代雖有此一派的風氣，但到了唐代，雖然已出現對蜀、吳英傑的稱頌作品，但大抵上主流文人還是以曹魏為正統，但到了北宋之後，「尊劉抑曹」的風氣已經在民間出現，蘇軾於〈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中寫到：「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節錄自《東坡志林》（臺北：木鐸，1982），頁7）可視為證明之一。

<sup>35</sup>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同註18，卷11，頁十七上-十八下。

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有使命至。孔明令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冠白衣而進，乃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謖，字幼常。為兄馬良新亡，因此掛孝……遂留馬謖在帳中敘話。孔明見謖高談闊論，甚是愛之，愈加敬重……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統大兵前進。<sup>36</sup>

但按《三國志》所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三國志·蜀書九·馬良傳》，頁四下），可見起碼在入川時，馬謖就已經在劉備陣營之內，而小說中馬謖出場為天使，但這並不能代表小說中的馬謖已經在劉蜀陣營為官。

依史，此時的馬謖在川地已當過「縣竹成都令、越嶲太守」，起碼是個地方官，但小說中卻以服喪之由而一身素袍出現，似乎有意將馬謖以一全新人物姿態，來取代「新亡」的馬良，同時除了建議南征的策略之外，當曹丕駕崩、曹叡即位，欲重用司馬懿時，也是馬謖為諸葛亮出了策略，讓魏國內部出了內鬩，司馬懿雖逃過死罪，但也被迫辭官歸鄉，這段虛構的情節，又更進一步地讓馬謖顯得在謀略上確有過人之處。

此外，對馬謖在街亭之戰的人物形象改編，比起《三分事畧》和《三國志平話》，顯得更為細膩，首先是在決定街亭守將人選時，作者安排讓馬謖自願前往，原文如下：

孔明大驚曰：「孟達做事不密，死之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也，誰可去守？」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然小可之地，干係有泰山之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略，此地奈無城廓，又無險阻，所守極難。」謖曰：「某自幼曆學到今，豈不知兵法也？量一街亭，不能守之，要某何用耶？」孔明曰：「街亭正北，吾之咽喉；若咽喉斷絕，吾豈能生也？街亭一失，蜀兵休矣！況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之勇，智謀過人，乃魏之名將也，恐汝不能敵之。」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叡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謖曰：「願責軍令狀！」孔明從之。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sup>37</sup>

原來史料中，諸葛亮是獨排眾議讓馬謖領兵，但到嘉靖本這樣的安排，變成了諸葛亮接受了馬謖的建議，而且旁邊還沒有反對的意見，同時在接下來的情節中，小說不只安排了諸葛亮對馬謖交代了詳細的策略，也因不放心而安排了其他的軍事行動；情節如此處理，雖還不致讓馬謖的個人形象與史料產生巨大的迥異，但卻已未後來的兵敗，安排了對照的基

<sup>36</sup> 同前註，頁二十五上-二十六下。

<sup>37</sup> 同前註，卷18，頁六十九下-七十上。

礎，讓馬謖有了一個積極且期待立功的形象。

到了現場之後，馬謖與王平的對話，加深了馬謖原本在史料中就存在的自負形象：

卻說馬謖、王平兵至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卻令軍士伐木為柵，以圖久計。」……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憑高視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歸也！」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絕吾汲水之道，軍不戰自亂矣。」謖曰：「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吾汲水之道，是自取死耳，吾軍豈不死戰，以一可當百也？吾素讀兵書，深通謀略，丞相諸事尚問於吾，汝何等之人，安敢阻耶？」……王平累次苦諫，馬謖堅執不從……王平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的功也。」<sup>38</sup>

尤其史料中二人的描述中，馬謖的設定明顯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而王平卻是「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三國志·蜀書十三·王平傳》，頁九下。）的武將，這樣的對比，加上本段情節的對話，便讓馬謖態度上顯得更加傲慢、不聽諫言，且有獨攬功勞的意圖。

到了戰敗之後，馬謖逃回漢中，嘉靖本中安排讓他「謖自縛跪於帳前」<sup>39</sup>，並且被諸葛亮當場推出轅門外正法，過程中雖然馬謖的表現得算不上從容，但比起部分史料中可能的逃亡以及被關下獄等等情況而言，還是顯得較為磊落，同時小說也將馬謖信件的內容，轉成了現場對諸葛亮的哭訴，加強了故事情緒的渲染力，讓馬謖的人物在最後呈現出較為真摯而另人同情的一面，可以說是將過去馬謖負面的形象進行了一次精細的調整。

## 四、馬謖人物形象的意義

沈伯俊（1946-2018）在《羅貫中與三國演義》一書中，針對「《三國演義》的人物塑造方法」，歸納出了三點，分別為「把人物放到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中，通過他們各具特色的言行，表現其不同的性格。」、「採用典型的情節和生動的細節來突出人物性格」和「運

<sup>38</sup> 同前註，頁七十一下-七十三上。

<sup>39</sup> 同前註，卷20，頁四上。

用誇張、對比、襯托、側面描寫等多種手法來塑造人物。」<sup>40</sup>對馬謖形象的塑造，則主要是前兩者。

檢視三國故事將馬謖形成改變之後，對於整體情節發展而言，可以作出以下推論——馬謖的人物形象，為的是襯托、推高、維護諸葛亮在三國故事中的地位，而在不同的時代持續進行的不同改編。

身為蜀漢代表人物之一的諸葛亮，在三國歷史和故事中，皆受到古今甚多讚譽，但若回到《三國志》中，則可以找到對諸葛亮的負面評論，如裴松之在馬謖傳後的注解，引述習鑿齒（?-?）的觀點便是一例：

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三國志·蜀書九·馬良傳》，頁五下。）

習此段批評，明顯和諸葛亮的主流形象有所落差，<sup>41</sup>但三國故事的創作者們，在整個故事發展的過程之中，無論贊成與否，只要參閱史料，皆難以對此類評論完全忽略，尤其街亭之戰造成的北伐失利，更是諸葛亮在軍事上前所未有的挫敗，這必然有損於諸葛亮崇高不敗的策士、智者形象。<sup>42</sup>

唐代文人對諸葛亮的推崇在文章中已多有所見，到了北宋之後，中國上至政府下到百姓，尊劉抑曹的風氣已成主流，社會對諸葛亮的整體推崇，理應比前代又更加深了許多——必然要強調的是，三國故事的發展有很大一部分，並非於紙本的文章，而是於民間的說話

<sup>40</sup> 沈伯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北，遠流，2007），頁162-163。

<sup>41</sup> 習鑿齒的記載是否完全符於史實，是有爭議之事，如王文進便指出：「魏晉時期不同地域士人間的爭勝抑揚素來蔚為風氣……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對同件事情的記載不同，已經讓人相當困惑，這很可能說明了《襄陽記》發揚襄陽人物的傾向更形嚴重……但是透過盧弼的論證，應該足以推測《襄陽記》記載的史料應是經過刻意修飾與改寫，或者根本有相當濃厚的虛構成份。」（節錄自《裴松之《三國志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臺北：新文豐，2017），頁60-63）然裴松之所引之論，則邏輯上是通順的，無論是否符合習鑿齒的個人意志，這都已經成為留傳後世的一段具有歷史價值的評論了。

<sup>42</sup> 祝秀俠指出：「我們說諸葛亮是一大策士，這『策士』兩字的含義還須相當說明。從前策士並不單含有政治家的意味，也不能籠統說是相當於所謂『智囊』，用現代的稱謂來說，大約是『幕僚長』和『參謀長』的合一，幕僚長是屬於政治方面的，參謀長是屬於軍事方面的。幕僚長而兼參謀長就是所謂策士。因為策士不僅要策劃政治，而且要策劃軍事，古來的策士，類皆『文武兼資』。我們以此來看諸葛亮，他真是策士的代表典型。」（節錄自《三國人物新論》（臺北：中外圖書，1979），頁3）

藝術與戲曲之間——在此氛圍之下，就算有創作者有意違反社會整體氛圍，書寫對諸葛亮較有批判性的作品或文章，一方面可能難以得到共鳴之外，更可能在市場上無法存活。

於是，就街亭之戰的情節，創作者們試圖讓馬謖這個在歷史上本來就被認為有過錯的人物，透過改變形象來合理化諸葛亮用人上的失誤，以及在情節的改編後為諸葛亮分擔更多責任，就成為從目前主要的三國故事，尤其是嘉靖本往後的小說情節發展中，可以看到的明顯刻痕。<sup>43</sup>

以人物形象而言，馬謖在《三分事畧》中直接被抹去，等於是消滅了諸葛亮生平識人的最大污點；《三國志平話》中則將馬謖塑造為「酒醉」、「勸不住」，且連守城任務都無法完成的魯莽形象；雖然《三分事畧》與《三國志平話》整體而言是與史實有較大出入的作品，但從他們的改編，已經可以注意到，面對失街亭這樣重要的轉折點，兩部作品的創作者都選擇刻意地淡化馬謖的重要性，並藉此帶過諸葛亮的挫敗並企圖保持其於故事中的地位。

而到了嘉靖本中，創作者則有意識地在不同的階段，調整了馬謖的形象，使其比史料中的形象，顯得更為清新脫俗且看似值得信賴，然後在街亭之戰中自薦領軍——這點除了強調馬謖有立軍功之心外，還讓諸葛亮逼他立了軍令狀，看似諸葛亮就是失算用了馬謖，在當場仍是個合情合理的選擇，且處置上亦顯謹慎。

到了北伐失敗回到漢中，馬謖勇於赴義的形象，又讓讀者對他產生了同情之情，掩蓋了歷史中那段試圖逃亡的負面形象，再加上史料與情節中皆有軍隊為馬謖哭泣的敘述，更是加深、渲染了他人物形象中所帶著的悲劇色彩。

於是，雖然無論有沒有真正看過《三國志》，讀者都會知道諸葛亮用馬謖，是違背的當初劉備說的：「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三國志·蜀書九·馬良傳》，頁五上）的告誡，但在讀者心中，難免產生一種對馬謖悲劇人物的同情，進一步也將這樣的情感轉移到對諸葛亮的決策之上，自然也就較難出現如習鑿齒那樣的負面評論。

就情節發展來說，魏軍派出的都督，從張郃變成了司馬懿，其實是就是為諸葛亮解套的前置步驟，畢竟張郃雖為魏國名將，但聲望自是遠不及後來成為「高祖宣皇帝」的司馬懿，做為諸葛亮的對手，也才能算得上對等，同時也顯得馬謖過度自信和輕敵，在街亭現

<sup>43</sup> 針對三國故事的創作者們必須美化諸葛亮的必要性，除了市場需求之外，在整個文化美學上也存在著需求性，對此陳慶元指出：「作者擁護抑曹，雖是迎合了群眾和儒家思想的需要，然而由於作者是基於『忠於史實』的大前提下作為全書的骨幹，自然無法寫出違逆歷史的結果，這已埋下悲劇意識的因子。歷史上的勝者是司馬氏（廣義的說法也可將曹魏算入），這是作者不能更動的事實，然而作者讚揚的卻是處於失敗一方的蜀漢，因為道德感將之視為正統，卻又不得不接受維護道德一方落敗的事實，這便是一種『理想的失落』，悲劇意識因而透顯出來……理想雖失落，讀者卻對失落的理想繼續執著與懷想，在無可抗拒的歷史進程下，這份悲劇意識與其說是作者造成的，毋寧說是儒家傳統所造成的。」（節錄自〈毛本《三國演義》的悲劇意識〉，《東海中文學報》第26期（2013），頁152。）



場，面對連諸葛亮都尚且忌憚的敵人，馬謖竟還不聽王平之勸，執意違反諸葛亮軍令，這樣一來，敗仗的最大原因，就大部分且合理地被歸到了馬謖身上。

除了對手不同外，諸葛亮用馬謖的場景，也有了極大的差異——情節裡啟用了自薦而沒有受到眾人反對的馬謖，這就已經為諸葛亮的獨斷脫身，更不用史料裡明載當場還有魏延、吳懿（?-237）等有實戰經驗的蜀軍將領在場，且被薦為先鋒，而諸葛亮卻未用他們的事實。

其中，魏延無論在歷史或小說情節中，皆存在與諸葛亮有嫌隙的記述，故而沒有派他鎮守街亭，還能得到合理的解釋；然而，另一個將軍吳懿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除了吳懿之前就在劉璋手下帶過兵之外<sup>44</sup>，他還有劉備穆皇后的兄長這一層皇親國戚的關係，而《華陽國志》中也記載於建興元年時，吳懿便與向寵、魏延一請被封為「都亭侯」<sup>45</sup>，按《三國志》中所載，曾封都亭侯者，還有公孫瓚、馬超、袁琳、張惇等人，明顯是專門授予武將的爵位，這些都證明了吳懿理應比從未帶過兵、打過仗的馬謖，有更好的條件和經驗來鎮守街亭。

那為何諸葛亮不願用吳懿？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與蜀漢內部荊、益兩派的權力鬥爭有直接的關係，這點從〈出師表〉中對後主強烈的用詞以強調自己主導地位的發言可以看出端倪之外，與同為託孤大臣、出身益州的李嚴（?-234）後來的政爭，也是一個證明——吳懿不只和李嚴同樣，是自劉璋時期留下的益州派之外，又加上他當時有國舅的身份，若讓吳懿於此時立下重要戰功，難保諸葛亮的權力與荊派的勢力不受到影響。<sup>46</sup>

而當初就是跟隨劉備入川的馬謖，不但出身荊州名門，諸葛亮自己亦與之親近，對他在軍事的才華上也抱有一定的期待，若從這個角度來看，便為諸葛亮在當下獨排眾議，讓馬謖領軍在前，提出了一個可能且合理的解釋。<sup>47</sup>

但這也就表示，諸葛亮用馬謖的這個錯誤決定，除了他自己的專斷、違背劉備遺訓之

<sup>44</sup> 裴松之在《三國志》中注曰：「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節錄自〈蜀書十五·楊戲傳〉，頁十三下。

<sup>45</sup> 原文：「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頁387。

<sup>46</sup> 關於蜀國內部的派系問題，張鑫指出：「劉備草創軍事集團之始，以關羽、張飛為代表的元老派便與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荊州派發生也據；蜀漢政權建立之後，內部的派系鬥爭愈演愈烈，元老派、荊州派、益州派相互爭權；劉備與諸葛亮相繼去世後，新舊派系實力隨即發生消長，內耗不斷直至蜀漢政權滅亡。」其中，吳懿的身份明顯偏向益州派，而且同李嚴一樣是屬於益州派裡的老臣，不同於費禕、蔣琬等被諸葛亮重用的益州派後輩，和諸葛亮的矛盾較大。見張鑫：〈三國蜀漢政權派系動態分析〉《巢湖學院學報》第100期（2010），頁113-116。

<sup>47</sup> 張寅瀟於〈從蜀漢派系鬥爭看馬謖之死〉（《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19））一文中，提出過類似觀點：「諸葛亮之所以在首次北伐之際違背眾議，棄魏延、吳壹等宿將不用，而任命從未領兵的馬謖為先鋒，主要是因為諸葛亮急於提拔荊襄人才、培養自己軍事接班人。同時，諸葛亮也為戰爭初期的一時優勢所迷惑，低估了魏軍的戰力，以自身為樣板，錯誤地認為馬謖通過一兩場戰鬥便可以從一位從未領兵打仗的軍事參謀迅速成長為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頁31。

外，還夾雜著個人的政治利益盤算，這樣的觀點，必然損傷諸葛亮在情節中被塑造的種種正面形象。

於是嘉靖本的作者便將這一段遭眾人反對的部分給省略，加入了馬謖自告奮勇的情節，避開了上述的問題，甚至還在撤退時，不但不提諸葛亮駐軍或就離街亭不遠，卻不派兵相救之事，還虛構了諸葛亮因身邊兵少，而引發空城記的情節，讓諸葛亮於極度危難的情況下，不費一兵一卒嚇退了司馬懿與他的大軍——對比馬謖的失敗，塑造、加強了諸葛亮的臨危不亂與神機妙算；而回到漢中之後隨即問罪並斬馬謖的情節，又加深了諸葛亮軍令嚴明、不循私情的形象。

由此往後，馬謖的人物形象，在三國故事中大抵確立，雖說街亭之戰，馬謖確實違背的諸葛亮的調度，但就根本的原因而言，早在諸葛亮決定用馬謖領兵之時，街亭基本上就可以說是丟了，而真正的始作俑者、真正應該負上最大責任的人，其實就是諸葛亮自己，而馬謖的歷代人物形象改變，為的也就是要遮掩、略過，這個明顯不會受到支持蜀漢為主流的受眾們所喜愛的細節與議題。

## 五、結語

馬謖在街亭犯下的錯誤，基本上是明確也難以平反的，他身為備受諸葛亮期待的人物，卻在第一次北伐的關鍵戰役上，以不遵諸葛亮節度這樣的原因敗下陣來，直接地導致了第一次北伐的失敗。

但戰爭不過是政治中一種較強烈的手段，一場對外戰爭的引發，亦可能不只是為了面對外敵，國家內部的矛盾或許也是觸發戰爭的原因之一，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討論，則歷史中諸葛亮發動對魏的戰爭，合理推斷不會只有「復興漢室」這樣單一的因素。<sup>48</sup>

然而，史實中諸葛亮帶著的政治意圖，並不一定都適合後世三國故事的創作者們，用以安排、形塑一個使讀者、觀眾們都能喜歡的「諸葛丞相」，<sup>49</sup>尤其是在第一次北伐之前，

<sup>48</sup> 關於歷史中諸葛亮堅持北伐的原因，符麗平指出：「諸葛亮北伐有兩個原因，一是實現自身抱負；二是避免激化君臣之間的矛盾，保全自身安全，信守對先主劉備的誓言。當把這兩個原因放在一起考慮就可以很好解釋他為什麼要北伐，以及至死北伐的原因。」，節錄自《從三國史到《三國演義》》（成都：四川科學技術，2016），頁226。

<sup>49</sup> 關於諸葛亮的人物形象，沈伯俊指出：「諸葛亮逝世以後的一千餘年間，歷代胸懷壯志、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深情地緬懷和頌揚著他，廣大民眾一代又一代地傳頌著他的業績，各種通俗文藝也反覆渲染著他的故事。羅貫中繼承了這種尊崇諸葛亮的社會心理，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了通俗文藝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創造，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高雅、睿智、充滿理想色彩和藝術魅力的諸葛亮形象，一個家喻戶曉的光輝形象。這樣的諸葛亮形象，雖以歷史人物諸葛亮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變異，比其歷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範，成為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無比智

諸葛亮剛剛平定南方的孟獲，知人善任、能征善戰的形象達到了一個高峰，但卻在街亭發生了因為種種可能的政治因素，而選擇起用經驗不足、臨陣表現嚴重失格的馬謖，這樣明顯而不够理智的判斷失誤——就算創作者們希望將情節按前述安排，凸顯出其中矛盾、衝突而或能讓小說顯得精彩，但在崇劉抑曹的氛圍下，這樣的處理方式，合理推斷是難以得到大眾歡迎的。

故而，街亭之戰的情節改變，與馬謖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就成為了幫諸葛亮開脫的最好方式，相對起《三分事畧》與《三國志平話》中較簡略、粗糙的處理，嘉靖本則選擇美化了馬謖部分的形象，並透過戰爭情節大大小小的改編，<sup>50</sup>讓讀者能合理地相信了此次諸葛亮會用馬謖上場，本意是惜才、給與表現的機會，而不是因為專斷、不聽勸與背後存在可能的種種政治盤算。

就結果來看，經過嘉靖本後，街亭之戰的情節與馬謖的人物形象，確實也就大致抵定至今，諸葛亮在三國故事中的形象與地位，確實也未因此次的挫敗，讓讀者產生更多的負面觀感甚至幻滅，針對此現象而言，這個改編是相當成功的；但同時馬謖的遭遇，也值得後人省思，在社會集體認知下所產生的既定印象與概念，是否存在著不同於真相的可能性？同時，對過去相信已久的種種說法，也應該要被認真檢視，所謂「認知」的本身，並非必然是真正的事實。

---

慧的化身，成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節錄自《羅貫中與三國演義》，頁 58-59。

<sup>50</sup> 嘉靖本這樣的故事改編，並不只用於街亭之戰，整本小說中的許多戰役都有被修改過的情況，並且也對受眾乃至於社會造成了實質影響，對此陳穎認為：「作為典範的戰爭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的卓越貢獻不僅僅在於寫出了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興廢爭戰的歷史規律，而且在於把這樣具有典型意義的戰爭具象化為『人才與戰爭』、人物性格與戰爭、民族心理與戰爭等一系列藝術化的典型情節和細節。小說雖然不是教科書，但如《三國演義》這樣把戰爭中的戰略戰術的運用，尤其是謀略對戰爭命運的決定作用寫得那般出神入化，是任何戰爭教科書都難以企及的，以至於後人無不把《三國演義》既當小說看又當『武經』讀，其在軍事戰爭、外交以及商戰方面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其文學的影響。」節錄自《中國戰爭小說史論》（上海：上海三聯，2008），頁 14。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晉〕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2011年。
-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2007年。〔晉〕習鑿齒著，黃惠賢校補：《校補襄陽耆舊記》，北京，中華，2018年。
- 〔唐〕李商隱：《李義山詩集》，上海：掃葉山房，1920年。
-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臺北：河洛，1974年。
- 〔宋〕司馬光著，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臺北：文光，1972年。
-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1975年。
- 〔宋〕蘇軾：《東坡志林》，臺北：木鐸，1982年。
- 〔宋〕蘇轍：《蘇轍集》，臺北：河洛，1975年。
- 〔元〕王實甫等：《孤本元明雜劇》，臺北：臺灣商務，1987年。
- 〔元〕佚名：《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海：上海古籍，1994年。
- 〔元〕佚名：《新全相三國志平話》，上海：上海古籍，1994年。
- 〔元〕佚名：《三國志傳》，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本。
- 〔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1994年。

### 二、近人論著

- 孔令紀等主編：《中國歷代官制》，山東：齊魯書社，2010年。
- 王文進：《裴松之《三國志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臺北：新文豐，2017年。
- 沈伯俊：《羅貫中與三國演義》，臺北，遠流，2007年。
- 尚志邁：〈馬謖之死考辨〉，《張家口師專學報》第16卷第3期，2000年。
- 祝秀俠：《三國人物新論》，臺北：中外圖書，1979年。
- 張月中，王綱主編：《全元曲》，鄭州：中州古籍，1996年。
- 張寅瀟：〈從蜀漢派系鬥爭看馬謖之死〉，《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19年。
- 張鑫：〈三國蜀漢政權派系動態分析〉，《巢湖學院學報》第100期，2010年。
- 符麗平：《從三國史到《三國演義》》，成都：四川科學技術，2016年。
- 陳慶元：〈毛本《三國演義》的悲劇意識〉，《東海中文學報》第26期，2013年。
- 陳穎：《中國戰爭小說史論》，上海：上海三聯，2008年。

- 劉硯秋：〈馬謖缺失於「南征戲」的主要原因略論〉，《湖北文理學院學報》第 42 卷第 6 期，2021 年。
- 潘志忠：〈由《孫子》析論馬謖失守街亭—以《三國演義》為例〉，《正修通識學報》第 16 期，2019 年。
- 鄭柏彰：〈馬謖敗於街亭試論—詮構諸葛亮從「違眾拔謖」到「揮淚斬謖」之本末源流〉，《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 1 期，2004 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2009 年。
- 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上編：成書研究》》，臺北：龍視界，2014 年。
- 〔日〕中川諭：〈黃正甫刊《三國志傳》三考〉，《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10 年第 7 期。

#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 the Battle of Jieting & The significance of Ma Su's character change

Hsieh Yu-teng\*

## Abstract

The Battle of Jieting was the key battle for Zhuge Liang's first failure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Masu is the key man who led an army to guard the Jieting. Masu's 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usually is adapted in later generations with diverse shapes of characters; however, his impression is nothing left but only the lost street pavilion.

From the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Masu had against Zhuge Liang's commands during the war, which led to the defeat of the Shu army. Despite the cause-and-effect of the defeat and story plots are generally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any story detail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historical facts with carefully investigating Masu.

Such differences in details are especially mainly on the personnel arrangements, the retreat situation, and the character image of Masu. From the comparisons of the differences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the creators not only follow the plots of the Three Kingdoms but also deal with this issue consciously.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changes in Masu's character images and the meanings behind them by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oryline of the Battle of Jieting.

**Keyword :** Jieting 、 Masu 、 Zhuge Liang 、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 The Three Kingdoms

---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